

于沛 周荣耀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论文集

1964—2004

· 俄罗斯 东欧 中亚卷 ·

于沛 周荣耀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学术论文集

1964—2004

5. 俄罗斯东欧中亚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于 沛 周荣耀

编 委 孙惠安 刘 军 李敦球
吴必康 张顺洪 张晓华
赵文洪 徐建新 黄立弗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天勇 崔宪涛 郭沂涟
夏 寅 冯慧茹

目 录

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李显荣 (1)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纪念第一国际成立一百二十周年	曹特金 (19)
苏联 20 年代的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问题	闻 一 (36)
从无限专制制度到改行君主立宪	
——试析 1905 年以后俄国政体的演变	王清和 (56)
试探 19 世纪中叶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原因	孙成木 (72)
俄国民粹派的功与过	邵彦秀 (85)
论耐普曼的组成、性质及作用	吴恩远 (100)
苏美英首脑雅尔塔会议	侯成德 (122)
彼得改革的成功与康有为变法的失败	陶惠芬 (133)
论卡达尔的经济改革与外部环境	阙思静 (146)
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	孙耀文 (161)
试析 1948 年波兰的转折	
——苏联模式在波兰的实施及其破产	刘邦义 (172)
试论二战前后英美的东欧政策	李 锐 (186)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历史的辩证的演化	
——有关苏联剧变根源的几点思考	马龙闪 (196)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	葛新生 (209)
20 世纪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问题	马细谱 (221)
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探析	黄立第 (233)
对斯拉夫人发源地推论的分析	王 丹 (252)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苏联兴亡的启示	陈之骅 (269)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	
——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	沈志华 (279)

论二战爆发前苏军西进过境问题	康春林 (307)
西伯利亚开发与俄国现代化 (1861—1917 年)	王晓菊 (322)
1905—1917 年俄国国家杜马制度实践的历史意义	侯艾君 (333)
试论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回归	孙建廷 (341)

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李显荣

李显荣（1934—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3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黄亭市镇烟山村。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今俄国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1986年9月15日不幸因病逝世。专业研究方向为俄国/苏联史。曾任世界历史研究所欧美史研究室副主任、社会主义史研究室主任。主要代表作有：《托洛茨基评传》、《巴枯宁评传》、《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合著）、《俄国通史简编》（合著）、《十月革命史》（合著）等，参与翻译了《反对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路标转换派文献》等。

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种机会主义，而巴枯宁就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巴枯宁出身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身份参加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后来加入过第一国际。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之彻底形成，是在19世纪的60年代，即第一国际时期。因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对早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就它的危害性来说，比其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危害性更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不少反马克思主义流派都受过巴枯宁的影响，像后来泛滥于各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就是直接继承巴枯宁主义的衣钵。巴枯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在一个晚上废除国家”^①，他高喊“自由”（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平等）等滥调。直到今天，还有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像巴枯宁这样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反面人物及其无政府主义学说；同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

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他及其学说的批判中，可以更好地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在同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的辩论和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其渊源的。英国的葛德文（1756—1836年）、德国的施蒂纳（1806—1856年）和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5年）就是在巴枯宁以前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开山祖师。葛德文声称自己是“坚决地反对社会的”，并大声疾呼：“为了个性自由，要推翻国家和不要法律。”葛德文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代表了18世纪末叶的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的情绪和愿望，因为这时期的英国小资产阶级正由于工业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施行的残酷剥削政策而遭受着破产的痛苦。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较葛德文的更为明显，前者公开宣称：“我”就是意味着一切。他要“利己主义者”奋起反对妨碍本人自由的一切东西，以保障自己充分的自由。他极力赞美私有制，把独立的“利己主义者——所有主”联盟，看成是共同生活的最好形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它认为应当来一个“全宇宙的暴动”。

不过，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的正式形成，应归之于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中，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本性，得到极其明显的反映。他说：“自由之外，绝无政府，政治的概念是没有价值的。”^①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要求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是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格格不入的。他不仅反对国家、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蒲鲁东比施蒂纳对于促进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形成，发生更为直接和更大的影响。

巴枯宁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要求无限制的和更为绝对的个人自由。他诬蔑说：“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奴隶制度和粗野。”他并且大声疾呼：“我是自由的崇拜者，因为我认为只有借助于自由，思想、人格、幸福才有得到完全发展的可能；但我所崇拜的自由，绝不像我们的自由——有限的，形式上的，严格地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后一种自由无非是一种永恒的赤裸裸的说谎，在现实中它是代表以普遍的奴隶制度为基础

^① 《社会主义思想史资料汇编》，《无政府主义批判》（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的少数人的特权。我的自由不像卢梭学派及类似这一学派的其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所宣传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自由，这种自由经常是虚假的，经常是伪善的……但有权利称得上这个伟大的名字（指‘自由’——引者）的，只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它保障全部体力、智力和隐藏在每个人机体中道义力量的充分发展——这种自由，对它来说，没有其他界限……每个人的自由不为全体人员的自由所限制；这是经过普遍联合的自由，这是在普遍平等之下的自由，这是战胜粗暴势力的自由，这是战胜权力原则的自由；——在自由之下，我所理解的正是这种推翻所有天堂人间偶像的自由，最终它组织团结人类的新社会，并在各种各样教堂和不同国家的废墟上改造它。”^①这些话足以代表他对“自由”的看法。而巴枯宁的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正是其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出发点。所以他激烈地反对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国家及一切权威，认为这些东西妨碍了他绝对的个人主义自由。他正如蒲鲁东一样，认为对于社会应履行的忠实誓言是：“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②这种要求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和反对任何权威的主张，乃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巴枯宁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味抽象地谈论着自由，说什么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制度”。这样的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诬蔑和攻击。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怎么会没有自由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里，正如以前的阶级社会一样，绝不能有什么笼统一般的“自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再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这样：要就是承认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人民摆脱压迫、剥削的自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自由，也就是说，有消灭资本的自由和制止反动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自由；要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有反抗社会主义、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自由。巴枯宁抽象地谈论着“自由”，是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③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笼统地谈论“自由”，那实际上是

① 巴枯宁：《巴黎公社和关于国家的概念》俄文版，第2页。

② 《社会主义思想史资料汇编》，《无政府主义批判》（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7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为剥削阶级辩护，因为“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①

“自由”这个东西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之间也是存在着分歧的。看来，巴枯宁主要是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但自由这个东西，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它在历史的长河里是随着时代而发展的。自由和纪律，看来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巴枯宁之所以强调自由，一方面由于他过分地夸大了自由的作用，把它看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且能组织和团结人类的新社会；但更重要的一方面，乃是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一味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说什么自由“没有其他界限……每个人的自由不为全体人员的自由所限制”。因此，巴枯宁及其信徒总是违背客观的必然性来行动，这样就随处感到“格格不入”，必然到处碰壁。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要求有绝对个人自由，简直是痴人说梦。就是在阶级和国家消灭之后，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要求有绝对的个人自由，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巴枯宁认为只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无条件的平等，实现这种自由是可能的。因此，巴枯宁认为“平等是自由的绝对必要条件”。从这一论点出发，他剽窃了圣西门关于取消继承权的思想。巴枯宁颠倒黑白，把财产继承权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不平的根源，而财产继承权似乎是国家所确定的。因此，根据巴枯宁的逻辑，国家的消灭就导致财产继承权的消失，同时也就导致“正义”和“平等”的凯旋胜利。于是，取消财产继承权就成了巴枯宁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因为私有制才是阶级不平等的真正根源，最后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谈得上建立真正的平等。

从“平等是自由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一荒谬论点出发，巴枯宁还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平等”。在第一国际时期，他把这个口号正式写到他的宗派组织“社会主义民主联盟”的纲领中去，企图用他这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纲领相对抗。马克思给予这一机会主义理论以坚决反驳，指出“‘阶级平等’，换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言之无非是反映着资本与劳动协调的思想”。^①它是“毫无思想的胡说”。^②因为在阶级未消灭的时候，提出“阶级平等”的思想，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它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促使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讲“和平共处”。所以，恩格斯也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真实内容，都归结为废除阶级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③很明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承认什么“阶级平等”的，也绝不能承认超出废除阶级之外的平等。否则，那就是要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同坐在一把交椅上“平起平坐”。

二

在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巴枯宁是同马克思背道而驰的。

巴枯宁主张在一个晚上或一个早上消灭国家。他对于国家的否定，一方面从国家的对外政策上着眼。他说：“任何国家，按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国家不可避免要成为侵略国家；如果它不侵略别国，那么它本身将被别国侵略。”^④“它应当吞食别国，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吞食；它应当侵略别国，为了使自己不致被侵略；它应当奴役别国，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奴役；因为两个类似而同时是格格不入的强国，不消灭一方的话，是不能并肩存在的。由此可见，国家是最可恨的、最可耻的，是对人类的最大否定。它破坏地球上人们的整个团结，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归附于自己，这只是为了消灭、侵略和奴役所有其他的人们。它只是把自己的公民置于自己的警卫下和只承认自己领土内的人权、人道和文明，不承认自己国界外的任何权利……”^⑤另一方面，巴枯宁是从国家的对内政策上着眼来反对国家。他认为国家就是意味着统治和剥削，不管这国家是君主制的，立宪制的或共和制的，也不管这国家是哪个王朝的，哪个民族的或哪个阶级的，它都是赤裸裸地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所以，巴枯宁经常重复蒲鲁东的话：“国家只有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1947年俄文版，第219页。

②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09—110页。

④ 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俄文版，第14页。

⑤ 参看 IO. 谢科罗夫：《巴枯宁·M. A.》第3卷第2册。

使命——在经济上庇护特权阶级对人民劳动的剥削”，“谁谈论国家政权，谁就谈论着统治，但任何统治都是有以服从于这一统治的群众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国家是群众的敌人。”所以，巴枯宁对国家政权是恨之入骨的，把国家政权说成是他“极端憎恨的词和概念”。他认为惟一自然而又合理的政权，那就是社会集体舆论的政权，因为这种政权是以尊重所有社会成员为根据的，是不带强制性的，因而它是最有权威性的，而且是惟一全能的。

巴枯宁不能理解国家的实质，不能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历史上以往的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一味笼统地从国家的内外政策着眼来反对国家，其理由是似是而非的。难道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去“吞食别国”、“侵略别国”和“奴役别国”吗？不，绝对不会，因为这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难道社会主义国家还将“在经济上庇护特权阶级对人民劳动的剥削”吗？这绝对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消灭“特权阶级”，而且以消灭一切阶级为己任。

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反对，巴枯宁主要是从这样一个错误观点出发，即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是国家政权本身，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荒谬地硬说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资本。因此，在巴枯宁看来，国家就成了主要的灾祸，首先必须消灭国家，资本才会随着自行消灭；而国家消灭，也是解放个人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弄颠倒了”。^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根源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消灭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首先应当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至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只要消灭资本，即全部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情况，那么国家就会自行垮台”。^②

由于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因而他也就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虽然他也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是所有剥削形式和压迫形式的保护者，它是服务于一小撮特权阶级，而这一小撮特权阶级是坚决不容许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但在阶级消灭以前，巴枯宁就主张尽快消灭国家。他主张“国家应在社会中解散”，“国家应放弃一切强制政权，它应只局限于蒲鲁东所规定的那种从属作用，即作为简单的办公厅，类似服务于社会的主要事务所”。巴枯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68页。

并再三重复着蒲鲁东的话：“社会革命应导致于任何政权原则的消灭，那时候政府变成为简单的掌管公共事务”的机构。所以，他极力主张“政治上的集中应让位于经济上的集中，因为后者是构成文明的主要条件并创造着自由，对政府及统治阶级有利的政治上的集中化扼杀自由，扼杀私生活及居民的自发行动”。^①显然，巴枯宁从反对历史上一般的国家，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在开始时他使用着含糊的词句，用“国家创造资本”的胡说，做他的理论根据，但到后来，他干脆公开宣称，一切国家在本质上都是坏的，并污蔑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荒谬的行动。他说：“马克思先生所臆想的人民国家（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引者），本质上不外是从上而下的统治人民。”^②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真假学者所组成的一小撮新兴贵族对人民群众进行极其专横的统治”。^③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诽谤，完全暴露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代言人。

在同巴枯宁的论战当中，马克思、恩格斯驳斥了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和攻击。一方面，他们首先肯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不仅要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且要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④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国家的存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国家的存在，绝不是由于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条件，即由于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所决定。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正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及其他客观历史条件的存在所决定。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后，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还存在，那么作为维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也就必须存在。所以，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时这样写道：“当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还存在时，当无产阶级还在向资产阶级作斗争时（因为当无产阶级取得政

① 参看 IO. 谢科罗夫：《巴枯宁·M. A.》第3卷第2册。

② 《巴枯宁选集》第1卷，俄文版，第84页。

③ 《社会主义思想史资料汇编》，《无政府主义批判》（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1页。

权时，它的敌人还没有消灭，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死亡），无产阶级应采取暴力手段，所以也就是采用政府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尚未消失，他们应当用暴力铲除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应当采用暴力加速这种改造的过程。”^①

巴枯宁不顾一切历史条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尽快消灭国家，但消灭国家之后怎么办呢？在巴枯宁看来，随着政治集中化的消灭，随着国家的消灭，人们将采用自下而上的自愿组合原则，组成自由的公社，再由公社组成自由联邦。每个人可以自行退出公社，而每个公社又可以自行退出联邦。巴枯宁认为这种原则是保证个人充分自由的惟一原则。在他的心目中，只要有政治机构或带上任何政治色彩的社会机构存在，劳动阶级要获得解放是不可能的，他们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摧毁所有国家机器及一切现存社会机关。因此，向往于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巴枯宁，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认为“社会革命绝不排斥政治革命，相反，社会革命必定包括政治革命，同时并给予它以完全新的性质，使得人民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因为所有的政治机构和政权终究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暴动，庇护和捍卫当权阶级及剥削阶级的经济特权而建立的，那就很清楚，社会革命将应当不前不后地破坏这些机构和政权”。

巴枯宁不理解，而且也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彻底解放劳动人民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尽管巴枯宁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丝毫没有共同之点，二者之间是“横着一条鸿沟”。^②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求消灭国家，但在时间早晚和策略手段上是与无政府主义者迥然不同的。在这一问题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一）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俄文第2版，第6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53页。

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三）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这一点。”^①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而且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并不是马上就消灭国家，而是运用它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革命的暂时形式。”^② 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运用国家政权的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③

由于在对待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巴枯宁同马克思采取背道而驰的态度，因此，他在对待巴黎公社的问题上，完全暴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尽管巴枯宁宣称自己是“公社的拥护者”，但他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大肆歪曲。他认为巴黎公社是“特别明显地表露出对于国家的否定”，并千方百计地寻找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特征，企图证明巴黎公社正在实施他的有关消灭国家的论点。他从自己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在巴黎公社里可以实现自愿联合的自由公社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要任何“权威”。同巴枯宁的观点完全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正是在于：为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树立革命的权威。所以，恩格斯在同巴枯宁主义者论战时写道：“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给予反动派的威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会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来说，我们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责备么？”^④ 这是很概括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好地论证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俄文第2版，第29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14页。

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巴枯宁更加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巴枯宁在其所著《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写道：“革命的专政（指无产阶级专政——引者）和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引者）之间的全部区别仅仅在于外部的情况。实质上它们是一样，是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管理……所以它们同样是反动的。”^① 他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主义，另一方面产生奴役制……它在受它支配的人民身上只能促使产生和培养奴才气”。^② 类似这样许多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观点，充塞在《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该书于1873年出版。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这本反动著作的原文，并专门对此书做了概要，对巴枯宁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做了批判性的回答。

巴枯宁带着幼稚可笑和讽刺性的口吻问道：“难道整个无产阶级将站在领导地位吗？”“登上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马克思对于前者是这样回答的：“难道在职工联合会中整个联合会组成它的执行委员会吗？难道在工厂中没有任何的分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权吗？而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原则中，难道一切都是在‘上面’吗？”^③ 马克思对于后一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是在个别场合下在经济上反对特权阶级，而是达到足够的强大和足够的组织性，为了在同特权阶级作斗争时，能够采取一般的强制手段。”^④ 马克思紧接着指出，无产阶级的统治随着“它取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⑤ 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万古长存，而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失。因此，这也就批驳了巴枯宁的那种蛊惑性的宣传，说什么“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古千秋外，就不能有其他目的”。

三

巴枯宁反对一切专政，主张尽快消灭一切国家政权，那他的策略是什么呢？

① 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俄文版，第239页。

② 同上书，第280—2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俄文第2版，第615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策略乃是暴动。他认为人的愤怒情绪是基本的历史要素之一，自由的重要要素之一乃是人的暴动；而自由只能由“全民暴动和群众的从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① 他反对任何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神的还是人的，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对于破坏的热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热情，这是巴枯宁的格言。他认为没有破坏的热情，革命事业简直不可想象，因为“没有广泛和热烈的破坏（这破坏是有益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可能有革命，正是从破坏中和仅仅借助于破坏诞生新的世界”。^② 他举出例子：法国从来没有过如此的强大，像在 1792—1793 年、当它为国内的冲突所震撼的时候。巴枯宁由此得出结论：“在社会界如像在自然界中一样，没有斗争是死亡。”^③

巴枯宁把斗争看成是生活的基本因素，认为“斗争，这就是积极的思想，这就是生活，而积极的和有生命力的思想，这就是力量”。他企图用这些漂亮的字眼和带鼓动性的话，来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暴动做宣传。他提出自己一生的任务，不仅要与任何政权、专横权威作斗争，而且要与劳动群众的唯唯诺诺和顺从作斗争。他经常号召群众起来，积极抗议，反对一切。对于萨塔拉，他是非常崇拜的，认为萨塔拉是暴动精神的体现和象征，要所有的革命者模仿这一不屈不挠的暴动者。他称赞萨塔拉为“永恒的叛乱者，第一个自由的思想家和世界的解放者，他逼使人因自己动物般的愚昧和自己的唯唯诺诺而羞耻”。^④ 巴枯宁也非常赞美丹特，因为丹特充满着“萨塔拉式的愤怒情绪”和“革命热情”。

暴动，简直被巴枯宁作为偶像来崇拜。他说人民“仅仅从这条道路等待生路”^⑤。他认为“任何暴动，无论成功与否，经常是有益的”。为什么有益呢？巴枯宁肯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首先，因为暴动教导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发展他们的革命毅力；其次，因为在人民具有革命情绪的情况之下加上一定的有利条件，任何部分性的暴动也容易转变为全民革命起义。正因为巴枯宁坚信这一点：“任何暴动，无论成功与否，经常是有益的”，所以他亲眼见到无数次的暴动，有些他甚至参与其中，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巴枯

① 巴枯宁：《国家和无政府状态》俄文版，第 281 页。

② 同上书，第 32 页。

③ 巴枯宁：《巴黎公社》俄文版，第 15 页。

④ 巴枯宁：《神与国家》俄文版，第 5 页。

⑤ 同上。

宁并不感到气馁和灰心。譬如，在 1873 年，当得到里昂、马赛及巴黎等地的事件失败消息后，他对列巴哥里·莫克黎维奇说：“让一次、十次、二十次使我们遭到粉碎，但如果在第二十一次人民支持我们，那么牺牲也就得到弥补。”

无政府主义崇尚暴动，经常号召人民起来积极行动。但在暴动中所表现的主动性和坚决性来说，巴枯宁认为各个阶级是大有差别的。他虽然把农民看成未来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说农民“是最革命和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但却不认为农民是最适合于暴动的力量，而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摧毁一切国家和暴力统治的主要力量。依巴枯宁看来，从暴动的癖好或从暴动的猛烈性来说，流氓无产阶级是首屈一指的。这由于流氓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有较强的破坏性。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及资产阶级暴力统治的主要力量，不是流氓无产阶级，而是大工业生产中的工人阶级。因为这个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有高度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最坚强的战斗性，这使得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掘墓人，成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真正主要力量而巴枯宁否认这一点，胡说工人阶级因为“沾染了资产阶级习气”而不能担当这一任务。

巴枯宁虽然崇尚暴动，但他否认个人恐怖谋杀策略。本来，巴枯宁本人也是俄国的一个民粹主义者，而俄国民粹派中的很多人物是热衷于个人恐怖谋杀策略的。巴枯宁认为这种策略是对他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有害的，所以他还直接指责雅罗申斯基于 1862 年在波兰对康斯坦丁大公的谋杀，并批评卡拉柯佐夫对亚历山大的谋杀。因此，应当指出，不能认为巴枯宁是那些个人恐怖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开山祖师。那些个人恐怖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喜欢惯常在大街上、剧院里、咖啡店和私人住宅里抛炸弹，对政府的显要人物进行暗杀。

由于巴枯宁否定个人恐怖策略，所以，在暴动中他不主张单独行动，要求集合行动，坚持暴动的集体性。因此，他也承认组织的巨大意义。他说：“工人有许多，但数目不意味着什么，如果这许多工人没有被组织起来。”19 世纪 70 年代初，在法国里昂、马赛及其他许多城市里，人民革命运动之所以未获得成功，巴枯宁解释成正是因为缺乏组织。他写道：“群众，这就是力量，至少这是一切力量的本质要素；但群众缺乏两种东西：即组织和知识。这两种东西恰巧是构成一切政府的力量。”他并且认为“由于军事组织，由一千武装人员组成的一个营可以抵抗、实际上可抵抗着整整是被武装着